

# 融会儒道佛，发扬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优良传统 ——牟钟鉴教授访谈录

王志捷<sup>1</sup> 牟钟鉴<sup>2</sup>

(1. 北京行政学院 哲学与文化教研部, 北京 100044; 2.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牟钟鉴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宗教学家。他学术领域宽广，善于综合创新，研究成果丰厚。访谈中，牟钟鉴教授以三教关系研究为重心，介绍了他在学术上的主要观点与核心理念。谈及的主要问题包括：三教关系研究的重要性；探索三教关系史的学术历程；中华文化的“三教六家”结构与“多元通和”模式；以“新仁学”和“新君子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方面，牟钟鉴教授不仅提炼出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特征与模式，更视之为应当努力发扬的优良传统；访问者则把牟钟鉴教授治学的核心理念和学术风格概括为“以仁爱为体，以通和为用”。

**【关键词】** 中华文化；三教关系；多元通和；新仁学；宗法性传统宗教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20) 05-0012-09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0.05.002

牟钟鉴，男，1939年生，山东烟台人。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1957年至1965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生和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冯友兰、任继愈、朱伯崑诸教授。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87年底调入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现为该校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荣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职有：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中国宗教学会顾问、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山东尼山圣源书院荣誉院长等。

主要著作有《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新仁学构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老子新说》（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概说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与吕大吉合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宗教·文艺·民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涵泳儒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道家 and 道教论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版），《君子人格六讲》（中华书局2020年版），《我和我的师友们》（齐鲁书社2020年版）等。主编：《民族宗教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道教通论》（齐鲁书社1991年版）等。参与写作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1-4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4年出版），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发表学术论文650余篇。

曾获孔子文化奖、全国优秀教师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奖。

**【收稿日期】** 2020-07-04

**【作者简介】** 王志捷（1965—），男，回族，山东临邑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北京行政学院哲学与文化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宗教学理论等。

牟钟鉴（1939—），男，山东烟台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荣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中国宗教史、宗教学理论、文化理论等。

## 一、三教关系研究的重要性

王志捷(以下简称王):牟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采访。作为您的学生,多年来不仅亲炙您的教育,而且一直关注着您在中华文化领域的执著探索并从中不断学习获益。两年前您出版了《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这部书集三教关系研究之大成,填补了中国思想文化整体性研究的一项空白,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赞誉。请您在这里谈一谈三教关系研究的意义或价值。

牟钟鉴(以下简称牟):“三教”之说,在三教关系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流行。不过,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儒、道、佛三教中的“教”,是“道德教化”之教,不同于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而流行至今的“宗教”之教。教化之“教”,不仅包含神本宗教,而且包括人本学说,其着眼点在于能够引导人们去恶向善,进而改良道德风俗,而不是专注于出世、入世。

研究三教关系的意义主要有五点。首先,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在先秦诸子百家中,老子道家和孔子儒家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主流学派。到了两汉,道家思潮演化出黄老之学,儒家被独尊而成为官学。汉末黄老之学综合多种要素而宗教化为道教,佛教传入中国而初兴。及至魏晋南北朝,儒、道、佛成鼎足之势,三教初会,经过争辩、摩擦乃至冲突,中华思想文化以儒、道、佛为轴心的格局初步形成。从隋唐直至清末,虽然不断出现多民族多地区的多样性文化,又不断有外来宗教和文化进入,但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趋向,以及以儒为主干、以佛道为辅翼这样一个核心格局始终延续下来,成为最具稳定性的文化三角间架。三教互体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具有巨大的内聚力,不因暂时政治分裂和民族纷争而解体,能够长期延续发展。由此可见,不研究三教关系史就不能把握中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主动脉,从而无法在全局结构上准确把握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主要方向与基本特色。

第二,儒、道、佛三教的发展,是在彼此间的互动中实现的。这种互动有时表现为排异和质疑,更多的时候表现为聚同和互补,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可以说汉

代以后无纯儒、无纯道、无纯佛,各教都吸收了其他二教的精神营养,不仅丰富、提高了自身,甚至由于吸纳了他者的某些基因而促成了自身的转型。因此,不了解三教各自的特质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无法深入把握儒家、道家、佛家各自的历史。在有关其中一教的专门史研究中,我们不能要求学者们都精通三教及其历史,但是对于三教及其关系有起码的了解,却应当是基本的要求。

第三,三教关系中最先发生的是孔子儒家和老子道家的论争与互补,而儒道互补成为贯穿两千多年中华思想史的基本脉络,铸成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体两面,林语堂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孔子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导师,老子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导师。儒道互补体现了阴阳互补、虚实互补、群己互补、人文化成与返璞归真的互补。研究儒道互补才能把握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第四,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并逐步与儒道两两会通,实现了中国化。这是中华文化与外来异质文化之间一次大规模相遇及交融,就异质文化之间的和平融会而言,这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堪称成功的范例。研究与总结佛教同儒家、道家之间求同存异、互摄共荣的历史过程与经验,也吸取其中处置不当、引发伤害事件的教训,对于我们当今恰当地认识和处理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及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更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五,儒、道、佛三教合流的历史很长,覆盖面很宽,无论对于精英群体的性格,还是对于大众民俗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都有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所以研究三教关系和三教合流思潮的扩散与下移,有益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士阶层的性格特征和民众的信仰、心理、习俗的中国模式。比如,人们同时信仰三教或二教,神道与人文互相交融,人们的信仰普遍具有“混血”特征等等。这样,可以更准确地重新认识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进而对中华思想传统加以鉴别,取其精华,剔其糟粕,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毅勇、仁和、博厚、文明的民族精神,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此外,从国外传入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进

入中国后都逐渐与儒道佛三教相融通,在保持自身基本教义不变的前提下,不断中国化,减弱一神教原有的排他性,增强包容性并吸收儒道佛三教的仁爱通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多元宗教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其中,中国伊斯兰教做得比较成功。基督教的步子慢一些,但也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努力前行。

## 二、探索三教关系史的学术历程

王:您涵泳于中华文化之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您在儒、道、佛各领域的学术积淀而言,推出《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应该说是水到渠成吧?能否介绍一下您探索三教关系史的学术历程?

牟:实际上我的三教关系研究是一个十分艰辛复杂的求索过程。我对儒、道、佛三教经典的初步接触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当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相关观点和知识主要来自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诸位先生的讲授和著作。那时自己虽无创见,却对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极大兴趣,认为是一座智慧宝库。研究生毕业以后,由于被各种政治运动所耽搁,学术研究工作直到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参加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多卷本写作组,成为前四卷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不仅正式开始中国哲学史学术研究,而且直接承担了儒、道、佛三教斗争与融合课题的写作任务。任先生要求写作要重新从第一手资料做起,突破以往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旧框架,“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做一次严肃认真的探索”。他强调写作要重视地域性文化的差异,例如儒学出自邹鲁文化,道家 and 道教出自荆楚文化与燕齐文化,法家、纵横家出自三晋文化;魏晋以后,要重视儒、道、佛三教的互动与合流,从而厘清中国哲学的主要脉络。在《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我撰写了“《吕氏春秋》——秦汉哲学史的开端”“《淮南子》——西汉道家思想的理论结晶”两章,开始探讨儒道互补;又撰写了“汉代中后期道家思想的演变和道教的产生”一章,进入道教史研究领域。在《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

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我撰写了“《列子》与《列子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的斗争与融合”四章,更多地关注道家、道教和三教关系,也开始探讨儒家经学。《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分“儒教编”“佛教编”“道教编”“会通编”,在结构上体现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思想格局,我在“儒教编”中撰写了《隋唐儒教经学》一章,按照经学史的路子往下做。

这段写作前后约十年,我写的又都是过去别人没有写过的新领域,从收集、整理、解读资料,到参照前贤研究成果,再到提炼自我独立观点、框架和表述,做得十分辛苦,但收获丰硕,日益坚信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和写作必须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轴心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

王:此后在这三个领域,您都有深耕,而且是厚积薄发、常有创新,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参与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等重要学术组织的许多活动,促使我进一步研究儒学,其成果集为《儒学价值的新探索》(齐鲁书社2001年版)。20世纪80年代末我转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在教学与研究及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中陆续发表了一批关于儒家人物与经学、儒学的义理与当代、儒学的兴衰与未来的研究文章,后来集为《涵泳儒学》一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我很认同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的理念,深感时代需要儒学、儒学需要创新,于是近年写了一本《新仁学构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用以寄托自己“仁以为己任”的文化理想,也祈望“明体而达用”,对社会精神生活有所改良。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我的学术研究另一个主攻方向是中国宗教史,其中包括道教史。我与张践教授合写的《中国宗教通史》在200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就在一定程度上叙述了儒、道、佛三教互动的历史过程。

王:这部书的影响很大,似乎综合性的具有规模的中国宗教通史至今就这一部。

牟:这部书获得了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宗教学一等奖，被一些高校采用为教材，研究生用得比较多。

此外，为了给大学生开设经典阅读课，我在研究《论语》《孟子》的同时，花大力气研读《老子》，用七八年时间形成八十一章疏解，加上相关文献考证与义理阐释，写成一部《老子新说》（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同时，我由研究道家进入研究道教史，撰写了《中国道教》（广东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21世纪初我与山东省的相关学者一起进行调研，结合文献资料，写成《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齐鲁书社2005年版），梳理了全真道从山东兴起并走向全国的历史，有益于深入了解道教后期的发展，也更能认识三教合流对于道教义理转型的作用。我与中国道教学院、香港青松观道教学院及台湾地区道教界保持友好往来，这使我在书本以外的实际生活中去体验道教的人物、仪式、组织活动、生存方式、对现代生活的调适及存在的问题。2014年11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道家 and 道教论稿》，把多年积累的道文化专题系列论文汇集成册。由此，我对于儒、道两家文化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在儒、道、佛三教关系中，我首先关注的是儒道互补。在我心目中，儒道互补不单是中华思想文化的主脉和底色，对我个人而言，也逐渐成为我的自觉的人生哲学，特别是孔子儒学的“修己以安人”、老子道家的“返璞归真”，已经与我的精神生命融为一体了。写过的相关论文有《安身立命与儒道互补》、《论儒道互补》（与韩国林秀茂教授合写）、《儒道互补与治国之道》等。

佛学号称难治，学者视为畏途。我没有系统接受过佛学的训练，主观上也未曾打算长期深入其中，因为无法再分身了。但是为了研究三教关系并给中央民族大学同学讲课，我不得不适当读点佛经和相关研究著作，以便对佛教有所了解。我读了若干佛典，如《心经》《般若经》《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肇论》《坛经》《弘明集》《广弘明集》等；又读了若干佛学研究作品，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

想资料选编》多卷本、郭朋《中国佛教史》多卷本、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由此我对佛学略知一二，其中汤用彤、郭朋、方立天的著作最使我受益。我尝试写了《鸠摩罗什与姚兴》《禅的真精神与平民性》《从赵朴老的若干诗词看人间佛教的真精神》《两方净土 三位弥勒》等几篇文章。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开始发表论三教关系的文章。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层集团对儒、释、道三教的认识与政策》《从儒佛关系看韩愈、柳宗元与李翱》《从中西文化比较中看儒释道》《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儒、佛、道三教关系与文化简论》《人文与宗教的互补——儒释道融合的重要经验》《儒释道与人生观》。这些文章的共同点是或提纲式的简短，或专注于某一时段，都未能充分展开。

与此同时，在中央民族大学我给研究生讲“儒、道、佛三教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逐步形成一份约四万字的讲课纲要，要点有：研究三教关系的重要性、三教各自的精义、三教关系历史阶段、三教同异、三教冲突论、三教融合论、三教合流表现、三教合流与中华文化。这个讲课纲要是通史的雏形。

王：您的教学与研究总是相互贯通的，二者间的成果转化实际上是相得益彰的。这一点很值得后辈学者学习借鉴。

牟：不过，“儒、道、佛三教关系及历史”这个题目太大太难，以一个人的有限生命不仅无法透彻掌握三教文化的历史与理论，就是毕生精力也难以通晓其中一家，这就是庄子发现的认知悖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我总怀有这样的心理矛盾，觉得自己的“儒、佛、道三教关系纲要”的知识基础不够，所以讲课纲要曾一度搁置，没有扩充成为一本专著。

可是三教之间相融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内部和而不同，聚同化异，互补互渗，共生共荣，若不对三教皆有所知，则一教亦无由真知，各家不同时期学派、人物亦复如是。研究三教关系与研究一教互为前提。要破解这个矛盾，只有两者同时进行，在动态中逐步化解。学者的研究大都侧重三教之一，或者一教中某一专题，但必须对其他二教宗旨、经典、人物有基本了解，这个要求

是可以也应当做到的。对于接受国学训练的青年学子来说，如果能够具备关于三教的要义及其关系的基本知识，可以形成较为宽广的视野，也便于进入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领域。所以，我决定对“儒、道、佛三教关系纲要”加以扩展和调整，希望形成一本内容尚属实在又简明扼要、条理力求清晰而层次分明、文字能够信达并通俗的书，主要供青年学生参考。我不是完美主义者，我甚至认为完美主义出不了学说，凡具创造性的学说皆有所得又有所失，只不过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不能胡乱标新立异。至于篇幅之简繁，则各有所用。鸿篇巨制固然可以为学术研究开路立碑，而雅俗共赏的中等篇幅的专著，亦能同时为学术探讨和文化普及加油助力，我希望自己的书属于后者。

### 三、中华文化的“三教六家”结构与“多元通和”模式

王：在考察三教关系时，您区分了“学”与“教”的关系，认为儒学不是宗教，进而提出自己的“三教六家”说，用以说明中华文化的结构与生态。怎样理解这些问题？

牟：开头已经谈到了，按照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儒、道、佛三教之“教”，主要是道德“教化”之义，而非“宗教”之谓，虽然其中也包含有宗教的教化。

关于儒学到底是不是宗教，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家发展到宋明以后就成为宗教了，理学就是儒教。这一点我不赞成，因为儒学的落脚点一直在现实人生，没有对于彼岸世界的追求；孔子是伟大的哲人而不是神。从历史上看，儒学不是古代宗教传统的继续，恰恰是从三代宗教传统中摆脱出来的一种人文主义思潮，它用“仁学”的人本精神改造了传统的神学。如果把儒学说成是宗教，不符合儒学的基本精神，即人道为本的精神，容易造成理论混乱。当然我更不赞成用“儒学宗教说”来否定儒学，进而把它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实际上，无论历史上的康有为还是现存于境外的孔教、儒教组织，都是要给予儒学一个宗教的形态，提高它的地位，而不是把它变成神学。

当然，在中国的传统中，人文与神道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因而儒学也具有宗教性，它不但

不反神道，而且还要纳神道入人道，保留一定的宗教性，如天命思想、慎终追远等，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行道德教化。

王：您在否定“儒学宗教说”的同时，发现并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被人们长期忽视的全民性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或称为敬天法祖教，那么它与儒学是什么关系？

牟：假设儒学是宗教，它便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宗教。而事实上，真正的历史悠久的中国大教是敬天法祖教，它早在三代时期就存在了，比作为学派的儒家要早得多。它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我称它为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个宗教自身形成了一个传统，在后来与儒家人学传统并行发展，二者并非一回事。

敬天法祖教，顾名思义，它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是维系中国宗法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又形成祭天、祭祖以及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等一套礼俗。它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其宗教祭祀活动一是依靠政权系统，皇帝在天坛祭天，在太庙祭祖，而不同等级有不同祭祀规格；二是靠家族宗族系统，祭天地君亲师和远祖近祖，遍及城乡。敬天法祖教是中国人的基础信仰，它不排斥其他宗教，相反，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各教都是在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的融合、调适中得以立足和发展的。

前面说了，敬天法祖教和儒学是两条线，敬天法祖教有它的教统，儒学有自己的学统，敬天法祖教的传承不受儒家学派的制约，儒学的发展也不依赖敬天法祖教。但是，教统与学统互相有交叉，特别是敬天法祖教本身未能形成一套相应的神学理论体系，它虽在制度层面，如规格、方式、仪式方面不断进行修订和调整，但在理论层面始终比较简单。所以，敬天法祖教需要儒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以便对其制度文化层面进行阐释。儒者对它的一套礼仪的规定所作的诠释和创新，就是礼学。

从更根本来讲，敬天法祖教和儒学都属礼文化。儒学是从人文的角度把礼文化提升了，孔夫子多了一个“仁”，把它提升到了哲学和道德的层面，而社会继续保持礼文化的宗教祭祀。这样，一教一学，互为表里，共同构成礼文化。

中国的三教实际上分属礼文化、禅文化、道文化，其中都包含着哲学和宗教两个层面。

王：就是您所说的中华文化的“三教六家”？

牟：对。印度佛教进入中国，被知识阶层理性化，这种佛学已经成为一种人生智慧，一种用来解除人类烦恼的，有超越精神的哲学，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宗教了。普通老百姓和普通佛教徒却离不开宗教，他们把释迦牟尼看成神，四大菩萨也是神，没有这个信念不能解决普通老百姓的人生困惑。所以我觉得佛学和佛教实际上同时并存，又互相纠结，共同构成了禅文化。

道文化也有哲学和宗教两个层面，就是道家 and 道教。开始的老庄道家，讲道法自然，没有道教，老子和庄子都是哲学家。后来有了道教，把老子变成了太上老君，变成了道德天尊，成为教主，又把《道德经》变成《道藏》的首经，把它宗教化了。道家和道教又有共同点，它们都以“道”为宗旨、为归依，都“尊道贵德”“清静无为”，二者时而并行、时而交叉。

儒、佛、道三教之间的互动，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来看，都是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从儒家入学与佛教、道教神学的关系来看，实质上是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从礼文化、禅文化和道文化各自内部来看，同样呈现着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中国思想文化亦哲学亦宗教，这就是它特有的精神。

王：所以您把中华文化的这个特征放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里来考察，提炼出中国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与经验。

牟：是的。通过比较，可以把世界文明概括为四大主流模式：一是以基督教为底色的欧美模式，二是以伊斯兰教为覆盖的阿拉伯模式，三是以印度教为主导的印度模式，四是以儒学为底色、儒道互补为基脉、儒佛道三教合流为核心的中国模式。

这个中国模式就是“多元通和”。它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的、以中和之道为精神方向的文化模式，其特点是具有较鲜明的综合性、融通性和人文理性；人道引导神道，政教关系是政主教辅；宗教自古就是多教、多神、兼信，包容各民族民间信仰，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哲学与宗教、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和谐是主旋律，通而不同；以敬天法祖为基础性信

仰，以人本主义儒学为主轴，向外开放，不断吸收外来的宗教和哲学，包括一神教，并使之中国化，成为多元和谐的因素；温和主义是主流，信仰之间的矛盾不易引起冲突与对抗，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与迫害异端，冲突是支流。多样性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渐行渐近，彼此沟通，吸收互渗，所以称为“多元通和”。

“多元通和”是一种良性的文化生态，符合自由平等和平友爱的精神，符合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是我们应当弘扬的优良传统。

王：您在《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中还把中华文化中多家多教的结构和关系精炼为“一、二、三、多”。

牟：是的。“一”是儒家主导，“二”是儒道互补，“三”是儒、道、佛合流，“多”是包容其他宗教和外来文化。这个结构模式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 四、生命哲学：新仁学与新君子论

王：您特别重视儒家仁学的阐发，强调儒学是中华文化的底色与主轴，仁学是其精髓，也一直把它当作生命哲学和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希望用时代精神来激活它，以实现明体达用的目标。您在这方面的思想是否可称为“新仁学”？

牟：冯友兰先生把“阐旧邦以辅新命”作为自己的文化使命，我对此高度认同，所以特别关注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受儒道佛三教哲学的熏陶和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启示，结合社会的现实需要，我提出一种生命哲学——新仁学，出版的《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内有三大命题：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第一个命题有两个主要内涵：一是有仁爱才有真正的和谐，爱心是体、和谐是用；二是倡导体谅人、尊重人的爱，而不是强迫的爱，就是要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这是仁和之道的精髓。第二个命题也包含两个要点：一是树立生命至贵的价值观，把仁爱生命视为一种信仰，把尊重生命作为文明的第一要义和社会正义的衡量标准；二是做人要堂堂正正，真诚待人，做性情中的真人，走出虚假的世界，成就真诚的人生、建设真诚的社会。第三个

命题亦有两点要旨：一是“道”乃贯通宇宙、社会、人生的最高真理，蕴含信仰、道德、科学的精义，兼具真、善、美的品格；二是强调人类要走向大同世界，必须发扬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通学，建设新通学，在文明、族群之间充分沟通，从利通（经贸互惠）、法通（国际交往规则）、文通（民间文化交流）、双通（文明间“美美与共”），一直到心灵的感通，才能有世界永久和平。

最近我又完成了一部书稿《通学刍议》，实际上是对《新仁学构想》的充实完善，可以视作其续篇，最主要的是强调只有心灵相通，才能做到以通为路，以道为归。

仁爱是仁通的动能，仁通是仁爱的至境。无仁爱，仁通无从做起；无仁通，仁爱难以感天下。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爱之心人皆有之，但这个仁之端常常被功利、争斗所压抑，必须自觉地将其萌芽加以扩充，它便会使人成为文明人，文明人造就文明社会，从而使整个社会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王：您觉得构建当代通学很有迫切性？

牟：是的。仁学的发展经历了“仁爱”之学、“仁生”之学、“仁通”之学三个阶段，形成了“爱”、“生”、“通”三大主题。最早是孔子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之大成，提炼出仁学，将传统礼乐文化上升为伦理型的东方仁礼人学。从孔、孟、荀之学到隋唐儒学，其“仁”的主要内涵是“爱人”。仁学发展的中期以宋明理学和心学为代表，其新仁学可用“仁生”之学加以概括。中期仁学确立了它的核心价值准绳，即生命是至贵的，爱护生命、尊重生命应是一切健康信仰中的最高信仰。仁学发展到后期出现了“仁通”之学，它广泛吸收了中西哲学、宗教、科学等各领域的成果，其代表人物便是谭嗣同。这个通学是“仁爱”之学、“仁生”之学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兴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新仁学。

通学的根本出发点是关爱人类。在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已经远远大于彼此之间的矛盾分歧，全球仁通的客观条件达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成熟程度。然而全球仁通的真实速度不仅没能加快，

反而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浪潮和民族宗教冲突频繁发生与军备竞赛不断加剧的态势，似乎地球村的目标离我们更远了。我们从世界文明转型的艰难中可以看到构建当代通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仁通之学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前面说的“多元通和”理念。哲学家冯友兰在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写道“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就是多元通和思维在学术争鸣、互鉴互补中的体现。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多元通和思维在当代文明关系上的最新表述，这十六字箴言最可贵之处，一是突显中华文明仁和的精华，二是尊重和学习他国他族文明的成果，三是提出世界文明的大同理想是多样性文明的会通，因而给人类文明转型确立了正确方向。

王：为了“明体达用”，您最近写了一部《君子人格六讲》，可以说是大家小书，很适合儒学的普及之用。

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受孔子的启示，在思考当下中国的道德建设、重建礼义之邦这些问题时，深切地感受到，要激活中华传统美德的恒在价值，不能只是停留在经典上和观念上，必须落实在培育文明人群上，于是写了论文《重铸君子人格，造就道德群英》，后来又用大量历史真实故事加以充实，形成这部书稿。

我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由三大要素构成：一是古代经典，主要是儒家“四书五经”，它包含着中华道德文化基因，能将基本道德规范不断向社会辐射、代代相传。二是核心价值，主要是“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它使全社会的道德行为有归向、有共识，并通过移风易俗，广泛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道德自律和舆论监督的准绳。三是君子群体，他们是道德精英，具有“仁、智、勇”三达德，因而有感召力，能够在社会各领域、各阶层起模范带头作用。

儒家认为依道德高低的层次，可将人分为四种：最高一层是圣人，人伦之至，万世师表，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如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

有各个时代的大贤德者；中上层是君子，以德修身，严于律己，关爱他人，受人尊敬，人们只要努力修养便可成为君子；中层是众人；下层是小人。在小人之下尚有罪人，已不属于道德舆论评价范畴，需要绳之以法。

儒家认为，以圣贤标准要求众人，不仅标准太高，远离生活，不易实行，甚或走向伪善；若仅以好人作为道德标准，不做坏人即可达到，要求过低，激励作用明显不足。孔孟诸儒之所以大声呼唤有德君子，盖在于君子既寄托了中华道德理想，又是可以效仿的榜样，它在人们面前不远的地方，只要好学力行便可到达。学做君子是儒家推行道德教化的有效途径。

我认为政界、商界、文教界以至社区的精英和骨干，都应当努力养成君子人格，进而形成可观的社会群体，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使整个社会“民德归厚”。我根据经典关于君子人格的论述，结合现实与自身体会，概括出“君子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这是我关于生命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王：我觉得“仁爱通和”理念实际上是贯穿您整个学术思想的一条主线。儒、道、佛三教在历史上的互动与会通，就是仁爱通和哲学的伟大实践，您已对此作出了提炼和总结。根据我的学习体会，您在宗教学理论创新方面，例如在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的创新中，首倡“温和无神论”概念，也是这一理念的运用。温和无神论的价值在于，划清了与法国战斗无神论的界限，超越了前苏联的“宗教鸦片论”和“与宗教斗争论”的激进主义，提出宗教学者对待宗教的态度，既不是信仰宗教，也不是反对宗教，而是用理性去说明宗教，以破除歧视，提倡包容，发挥宗教文化的正面功能。另外，您在创立民族宗教学学科和主编《民族宗教学导论》一书的过程中，为这个学科确定的宗旨与核心理念是“族教和谐，多元互补”，这实际上也是仁通哲学理念的具体表达。

综合起来，我不揣冒昧地用“以仁爱为体，以通和为用”来概括您的学术思想，不知当否？

牟：可以说准确吧。

王：您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已有三十多年了，曾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您常说自己特别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从教书育人的事业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尤其是在中央民族大学这样一个多民族和谐友爱的大家庭里，您的“仁爱通和”学术理念同“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的校训可以说有着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涵。请您简要谈谈“仁爱通和”理念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什么作用？

牟：这个问题提得很重要。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老师是多民族的，学生也是多民族的，我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多年，每天都在感受各民族老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友爱团结、彼此关心和相互帮助，使我生活得非常愉快。我和老伴不仅把各族学子当成学生，也当作自己的孩子；学生们不仅把我们俩当作老师，也当作自己的长辈亲人。他们毕业以后，一直惦念着老师，以各种方式传递仁爱之情，外地同学来京出差时总到家里探望，在京的同学更是逢年过节便来问候，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同学们平时也经常用微信和电话问安，讲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交流信息和感情。

我提出“仁爱通和”之道，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美美与共”，既自爱，又爱人，把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发扬起来，而且要“知行合一”，即身体力行，多做有益于民族团结的事，不做有损民族团结的事。扩大而言，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中国历史上，在儒家“仁爱通和”精神的主导下，儒、佛、道三教互相渗透，与尊天敬祖的基础性信仰一起，形成巨大的辐射力与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文化是无形的力量，国家是有形的力量，二者共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与稳定，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外部敌对势力和内部极少数分裂势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我们一定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保证。

我们既热爱中华民族，也能以天下一家的情



怀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使整个世界不再有战争和对抗，

这是人类文明健康发展唯一的正确方向，也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

##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to Develop Tradition of Chinese Diversified and Harmonious Culture**

### **—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Mu Zhongjian**

**WANG Zhi-jie<sup>1</sup>, MU Zhong-jian<sup>2</sup>**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Beij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Beijing 100044;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Professor Mu Zhongjian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 and religious scientist in China. During the interview, Professor Mu introduced his main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core ide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religions. The main issues addressed includ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religions;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religions; the Structure of "Three Teachings and Six Schools" and the Model of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and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life philosophy represented by "New Benevolence Theory" and "New Gentleman Theory". Especially in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Professor Mu propos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of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 and Harmon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regarded this as a tradition that should be promoted. Visitors summed up Professor Mu's core philosophy and academic style as "benevolence as the body, harmony for use".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three religions relations; New Benevolence Theory; patriarchal traditional religion

[责任编辑 乌仁图雅]